

● 陝西金石文獻汇集

●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 吳鋼主編

重刊玄道教碑石

● 刘兆鹤 王西平 編著

● 三秦出版社

全真開教秘語之碑

重陽祖師以正隆己卯之夏遇真仙于終南甘河鎮紫

霄口談明年庚辰再會於醴泉還留秘語五篇其辭曰

葛臨秦地泛游長安或貨丹於市邑或隱跡於山林因循數載覩見彌時

蒼生蓋是凶頑下寇今逢吾弟子何不頓拋俗海猛捨浮囂好凌霞於碧

嶠之前堪嘆氣於松峯之下幹放造化反覆陰陽燦列宿於元鼎之中聚

萬化於一臺之穴千朝功滿名掛僊都三載殷勤永鎮萬劫恐離來近身

沉泉下

莫將樽酒懸浮萬無向鄧中作紫腰龍虎動時拋雪浪水聲澄處碧塵消

自從有悟途中色迷意離於不計聊看朝九轉神丹就同奔逐高玄一遭

蛟龍煉在火蜂臺猛虎擒來因水晶強意莫言於論道亂說經機與事情

鉅是永集永是結精識鉛識汞性命傳 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鄭人張道

九轉成入南京得知友赴遂瀛

移手地陽洞下

陕西金石文献汇集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吴钢主编

重刊道教碑石

刘兆鹤

王西平

编著

三秦出版社

封面题签：程安东

陕西金石文献汇集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 编
吴 钢 主编

重 阳 宫 道 教 碑 石

刘兆鹤 王西平 编著

出版发行 三 秦 出 版 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204 研究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6

图 版 52 幅

字 数 191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168-1/K·64

定 价 38.00 元

陕西金石文献汇集

凡 例

一、《陕西金石文献汇集》辑录先秦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陕西境内现存的金文、碑碣、墓志、塔铭、经幢、摩崖、地刻、砖志、甲骨文、陶文、玺印、器物铭文等文献资料。

二、数量较少的甲骨文、金文、陶文、玺印、器物铭文分类编辑；对于石刻文献存量多的地区或单位，则按地区、单位编辑。各册按中国历史纪年编年顺序编排，并注明公元纪年。

三、所辑录现存的金石文献，每篇均有说明和录文。说明内容包括：标目、时代、撰者、书者、刊石者，出土时间、地点，搬迁经过，形制、纹饰、书体、行款、漫漶程度。重要碑石、墓志还可加考释或按语，内容包括必要的考证、文字校勘，以及史料、书法价值的评价等。具有一定史料、书法价值的碑石、墓志，字迹清晰者附以拓片图版，不能制版者附以照片；内容一般的只附录文；有的造像碑也附照片。

四、原石已佚而前人有著录和录文，只记标目、时代、撰者、书者、原存放地点或出土处，附录于后，以备查考；原石已佚而前人无录文但现有拓本者，则在辑录之列。

五、原碑石、墓志无题而由编著者自拟的，题上加星号。为说明方便，对原碑石、墓志题使用简称。录文中遇到的异体字、缺笔避讳字、俗体字一律径改，不出校记，不加说明。不易查对的字按原笔划照录。

六、碑石、墓志中明显的错字、掉字，录文时加注号，并在按语中说明；衍文、脱行，亦加注号，在按语中说明；前人著录与原石异文，以原石为准；前人录文不全或错误极多，按原石重新录文；原石刻文字字迹不清，按前人著录补入的文字，用小号字排印。文字不多的纪年砖、砖志、摩崖、题铭，在说明中已录，不另附录文。

碑石、墓志、拓片每行录完，末尾加「号」。

七、碑石、墓志中残缺及漫漶不清的字均加□；能看出缺几字的，缺几字加几个□；缺字较多而不知缺几字的，在括号内注明“上缺”或“下缺”；只能看出某字偏旁或一部分的，在□内照录。原碑文为尊敬而空格或另起行的，录文时不再空格或另起行，原碑文在讳、字下空格，以及错、舛、衍、倒，或错简等，在录文中加注号，并于后说明。

碑石、墓志的录文不分段，铭、赞另起行。

八、录文加标点符号，通常只用逗号、句号、顿号、分号、冒号，其它符号不用。

九、计量单位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公制。

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



重阳宫在今西安市西南约 40 公里处之户县西境祖庵镇北门外，紧靠公路有新修南向山门一座，进了山门往后是灵官殿，再后为祖师殿，殿后东廊立 12 通碑石，廊北是高耸 31 通巨碑的大跨度、高檐柱敞棚碑厅，这即是闻名遐迩的“重阳宫碑林”。最近重阳宫开始较大规模的重新修复。

碑厅和碑廊所存碑石共刻文 34 篇、诗词 6 组（首）、画像 2 幅、题字 2 帧、图 1 面。这些碑石，除 4 篇刻文和一帧题字为明清刻立、一首词为金时刻立外，其余全为元时刻立。像这样颇为集中又大量保护元代金石文献遗存者在国内实属罕见。1956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即将重阳宫碑石作为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物加以保护。

重阳宫是金代末期兴起的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修炼成道之地，经其高足马丹阳、丘处机等弘扬光大，元初全真教被奉为“国教”，风行于中国北方，重阳宫被尊为“祖庭”。后来，虽数经兴衰，但极盛时道士曾达万人，宫观规模之大（南至山根，北至渭河）为国内道观之冠，被朝廷褒封为“大重阳万寿宫”。众多高道在此经营、修炼，以至仙逝，后人为他们陆续刻立了“道行碑”，还有记载王重阳修炼事迹、思想以及皇室褒封恩奖的敕辞圣训亦刻之于石。这些碑铭文墨多出于金元朝野道俗名流之手笔，绝大多数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故为后世学术思想界和道教文化研究者所普遍关注与重视。《长春真人西游记》、《石墨镌华》、《天下金石志》、《金石萃编》、《金石续编》、《寰宇访碑录》、《书画题跋》、《潜研堂金石跋尾》、《辍耕录》、《长春道教源流》、《道教源流考》、《元代白话碑》、《元代白话碑集录》、《关中金石记》、《西安府志》、《续修陕西通志稿》、民国《重修周至县志》等书对一些碑石均有所著录和论评，而以《甘水仙源录》（著录十余篇）、《陕西金石志》（著录 14 篇）、《道家金石略》（约 30 篇）著录较多。但总观以往著录和论评，因限于历史条件和各书体例要求，一是著录不齐全，无拓片图录；二是录文有不少差错和缺漏；三是论评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

本书力求补前人著录之不足。在此，对重阳宫道教碑石的历史文献价值作些粗浅的探讨，是必要的。

首先，通过重阳宫碑石可以窥见全真教与金、元社会政治的关系，具有社会学意义。

全真教发展之初即受金皇室忽贬忽褒的影响而时起时落。据本书《全真教祖碑》载：“世宗皇帝知先生（按：指王重阳）道德高明，（大定）二十八年（1188）戊申二月，遣使访其门人，应命者丘与王也。^①命丘主万春节醮事，职高功。五月，见于寿安宫长松岛，讲论至道，圣情大悦，命居于官庵。又命塑纯阳、重阳、丹阳三师像于官庵正位。”然而，就在此前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冬，官府蝶发，马丹阳被迫离开关中，率徒东归宁海。又在“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金史·章宗纪》）。全真教及祖庭的发展，几度受阻。可是过了不久，到了“承安丁巳（1197）六月，章宗再诏王处一至阙下，特赐号体玄大师及赐修真观一所。十月，召刘处玄至，命待召天长观”（《全真教祖碑》）。由于高道王玉阳、丘处机、刘处玄先后受金世宗、金章宗的诏请礼重，全真教才得以重新发展。承安三年（1198）戊午，王玉阳在京师请“祖庵”为“灵虚观”，祖庭才得以重振玄风。这说明宗教的兴衰，直接受制于政治，在封建社会则决定于皇室的喜恶和其政治的需要。唐代以宗室为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为了维护其政治统治打起了圣祖老子的旗号来神化唐王朝。延至赵宋，真宗、徽宗、理宗都颇为尊崇道教。对此，本书《真元会题名记》有具体的述说。皇帝崇道，有出于信仰、为求长生不死的目的，然究其要则，是因于政治的需要，即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地位。

另一方面，道教的发展和演变，也往往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据本书《白云真人蔡公本行碑》所载，丘处机率高徒十八人“栉风沐雨，胼手胝足，跋涉数万里，见上（按：太祖铁木真）于西域雪山之阳。宗师承虚己之问，乃答：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既来之，则安之，此济世之要术也。是言既奏，深契上心，玉音奖谕，唯恨相见之晚。固被旨佩虎符，宗主天下道流”。元太祖受丘处机“民为邦本”，“必在乎不嗜杀人”思想的影响，他在“敕真人丘师”的圣旨中说：“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

^① 按《七真人谱》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一月三日玉阳真人奉诏至燕京，帝问延生之理，玉阳曰：“惜身全神，修身之要，端拱无为，治天下之本。”非在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二月，长春真人奉诏至燕。

云可尚。”（《大蒙古国累朝恩命之碑》）这就是说杀人如草芥的铁木真开始了由重“杀伐”到重“道德”的转移。他将丘处机奉为“神仙”、“国师”，屡屡下诏免除所有道院“差发税赋”，使之得到特殊的保护。因此全真教在元代皇室的宠重下得到很大的发展。重阳宫虽经战乱兵燹，却仍在元太宗、乃马真后、元定宗、海迷失后执政期间，“重道尊教未有如今日之极，道教蕃衍、教门增广未有如斯之盛”（《十方重阳万寿宫记》），大肆兴建殿堂楼庑，成为“天下道观之冠”。

从重阳宫碑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真教发展的初、中期对当时的社会人生曾发生过较大影响。像王重阳、马丹阳一类人本属士庶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他们不满异族在北方的统治，因而隐遁山林，修真养性，以求灵魂中所郁积之苦闷得到解脱。这反映了当时士庶阶层普遍的心理和情怀。加上重阳玄教提倡“积功累行”、“劝善止恶”，于是不仅士流影从，即使普通老百姓也纷纷入道。尤其是蒙古入驻中原之初，“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丘处机传》）。这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一些道观以惠泽德人。典型者如栖云王真人率领道众开渠引滹水入注祖庭重阳宫，“连延二十余里，穿村度落，莲塘柳岸，蔬圃稻畦，潇然有江乡风景，上下营磨，凡数十区”、“岁时丰登，了无旱干之患”、“实亦世世无穷之利也”（《栖云王真人开滹水记碑》）。这样，全真教就起到了平复民心、安定社会的作用，对此，元代的上层统治者当然十分欢迎。加上一些高道常为他们设醮祈福祝寿，因而倍加恩奖。现在保存在重阳宫碑厅的元代皇室册封奖誉全真教祖师和高道的碑石就有八九通。

任何宗教都要依靠政治的支持才能有大发展，不然就只能局限于民间或小范围。而宗教能不能取得政治的支持，一方面要看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本身对社会人生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从重阳宫碑石中看到，《孙真人道行碑》之题款为“皇元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孙公道行之碑”，褒誉之词无以复加，完全属于官场奖谥而贵盛至极，已与全真教安贫守贱、清静离欲、俭朴刻苦的初衷相去甚远了。他们住着豪华的宫观，过着王公贵族一样的生活。“物极必反”，继孙德瑄掌全真教事的蓝道元因蓄妻犯奸、腐化淫逸而获罪被黜。从此以后到元末全真教已外盛内衰，再无较有影响的高道出现。从重阳宫现存碑石来看，也再无高道的道行碑遗存。全真教到了明清，不被朝廷重

视，渐趋衰落，重阳宫也走了下坡路，宫殿多“倾圯不振”，“垣墉崩塌”，昔日胜景再也难以重现了。

从重阳宫现存碑石看，由于金、元朝廷的重视，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士流也多与全真教的高道交往甚密，为全真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关中有陕西京兆都总管田德灿“罄家赀”“以给”重阳宫“营建之用”（《十方重阳万寿宫记》）。据《洞真于真人道行碑》载，与于洞真交往者，“在汴则尚书左丞张公行信、平章政事侯公摯、司谏许公古、礼部尚书杨公云翼、王府司马李守节、修撰雷渊、应奉翰林文字宋九嘉，在燕则陈漕长时可、吴大卿章、张侍读本，在关中则参省王辅臣、郎中邳邦用、讲仪来献臣、同德寺丞杨天德、员外郎张徽、中书掾裴宪、经籍官孟攀麟、署丞张琚，盖当世景慕者也”。还有《杨奂等挽悼无欲真人诗》碑、《摹刻商挺等诗词碑》，都反映了地方官员与士流和全真高道的密切关系，使全真教的宗教活动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以至思想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

其次，重阳宫道教碑石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书法艺术价值。

一是史学价值。它颇为系统、清晰地记载了全真教，特别是重阳宫创立、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其中《十方重阳万寿宫记》、《重阳成道宫记》、《全真教祖碑》、《重阳祖师仙迹记》是带有综合性的记述，史的特色很鲜明。十四位高道的碑铭，亦不只是个人传记，从中可以窥见重阳宫和全真教发展起落的轨迹和状况。这些高道的碑铭还记录了当时阶级矛盾、社会习俗、人生际遇等方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中载：蒙古庚子（1240）、辛丑（1241）年间，“河北郝公总管家隶百余，阴谋南遁，得其显状，尽欲刑之。公闻之，连夜驰至其门，以善言诲导，亡者皆免。明年，城中群小数百，结连私逸，权府韩渊密知其情，议尸诸市以令众，感公一言，但斫其魁渠。太傅移刺宝俭，其母死，欲以二婢为殉，公以古葬礼正之，始罢议。凡契丹人以人殉死者，弊因以革。”透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真实的社会历史面貌和阶级压迫的激烈、残酷。

二是语言文字价值。重阳宫碑厅、碑廊现存有7通元代圣旨碑，其中5道是蒙汉文合刻碑，是极其重要的语言文字资料。这种蒙文是藏传佛教萨斯迦教派法王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受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于至元六年（1269）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成的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字），元世祖下诏颁行，官方文书均用此种字体书写。字形仿汉字方体，自上而下直写。现存八思巴蒙古字碑全国已发现者约有20余种，而重阳宫即

保存有5通。碑文为八思巴蒙古字与汉字合刻，八思巴拼写蒙古语，系文书原文，汉文据蒙古新字译出，用汉语白话体直译文义，“对于研究元代文献译名的还原及演变，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古代蒙古语言的研究也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31—632）。这些碑文的内容均为皇室下旨保护道观产业及减免赋税差发、褒奖高道诸事，又是研究元代宗教史及寺观经济的重要资料。碑文中记录了许多元代人、地名和名物制度等蒙古语专名，可资史家考订之用。

三是书法艺术价值。由于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贵盛，许多高道与朝野名流交往甚密，重阳宫现遗存的碑石文墨，许多出于名家手笔。《孙真人道行碑》、《敕藏御服碑》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的手迹。赵氏《石墨镌华》以前碑为据加以品评。《敕藏御服碑》碑阴“敕赐大重阳万寿宫”八个大字，为溥光墨迹所刻。溥光所书“帘”字，赵孟頫曾给以极高的评价：“当世书无逮我者，而此书乃过我。”《披云宋真人道行碑》为韩冲所书，《陕西金石志》认为此属“元之嘉刻”。元代著名文学家姚燧书《重阳祖师仙迹记》，赵氏《石墨镌华》评曰：“书全法平原”，“因以知胜国时不乏能书者也”。《天乐李真人道行碑》、《刘海蟾诗碑》为宋渤所书，笔力挺拔苍劲。其他诸多碑石，如《无梦令》、《清和真常二大宗师仙翰》、《全真教祖碑》、《马真人道行碑》等分别为王重阳、尹志平、李真常、李道谦、孙德或等高道之墨宝，各具特色，是研究道教文化的重要资料。

再就是重阳宫碑石记载了道教、尤其是全真教修炼的方法要旨。

《马真人道行碑》中记述马丹阳所论修道机枢为：“凡人入道，必戒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此外更无良药矣。”这和尹志平所谈的“以谦逊勤约为治心之要，以践履功行为入道之基”（《尹宗师碑铭并序》）一样，都是强调修炼的基础在于清心寡欲，修身重德。关于修炼的原则和方法，马丹阳说：“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静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又说：“行则措足于坦途，住则凝神于太虚，坐则匀鼻端之息，卧则抱脐下之珠。”（《马真人道行碑》）这些都是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典型全真派清修真言，与佛教禅宗颇为相近。还有《无梦令》、《全真开教秘语之碑》是专讲修炼的，受到当代气功界的重视。

有些碑石对老子所说之“道”作了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可供道教哲学研究者探讨。

关于诸多高道碑中所述的神异现象，权作神仙家言，是也非也，不必过分认真。

重阳宫所存主要是元碑，从形制上看其特点是上窄下宽，体形高大，气势十分雄伟。碑高一般均在400厘米左右，宽在130厘米左右，厚在40厘米左右。特大者如《十方重阳万寿宫记》，高516厘米、宽156厘米、厚50厘米；《大元敕藏御服之碑》，高523厘米、宽138厘米、厚35厘米；《马真人道行碑》宽153厘米、厚37厘米，高则达606厘米。这些高大的碑石，绝大部分保存完好，仅有个别如《弘玄赵真人碑》、《洞真于真人碑》等，或碑文漫漶，或碑端残损，或断裂重接。高大的碑石在宽敞明亮的碑厅里分两行排开，甚为壮观。其形制一般为螭首龟座，刻凿精细，形象逼真生动，显示了元代雕刻艺术的特色和水平。

本书在旧有著录之外增辑十余篇。所有碑石全有碑拓图版。另外有佚碑存拓3篇，佚碑存文1篇。录文以原石和拓片为据，参照诸家著录，补缺正讹，力求准确无误，力求成为一个较完善和规范的专集存本。在拓照和录文之后附有“重阳宫历史”和“重阳宫大事记”，使读者能对重阳宫的发展变迁有一个更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本书在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吴钢同志的主持下，得到省文物局、西安市宗教局、户县民政局、户县文物管理处有关同志的积极支持，特别是省道教协会副会长、西安市道协会长闵智亭和省道协副秘书长兼户县重阳宫道长陈法永的大力协助，又承三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主任靳疆、副总编邢良俊同志的认真审阅，按期付梓，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图版说明并考释由刘兆鹤同志撰写，并提供了《洞真于真人碑》之录文；其他碑石由王西平录文、校点并考释，附录一、二为王西平撰稿；图片由王新华拍摄。原拓片大部分由刘兆鹤同志组织摹拓。最后由吴钢主任批改审定。由于种种原因以及编撰者的水平所限，对于本书中的疏漏、错误，希望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王西平

目 录

- 王重阳书无梦令碑(金承安五年)[图 3 页]
-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蒙古海迷失后元年)[图 4 页·录文 57 页]
- 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恩命之碑(蒙古宪宗元年)[图 5 页·录文 59 页]
- 清和真常二大宗师仙翰(蒙古宪宗元年)[图 6 页·录文 63 页]
- 重阳成道宫记(蒙古宪宗四年)[图 7 页·录文 65 页]
- 洞真于真人道行碑并序(约蒙古宪宗二~五年)[图 8 页·录文 67 页]
- 李无欲本行碑(蒙古宪宗五年)[图 9 页·录文 70 页]
- 杨奂等挽悼李无欲诗(蒙古宪宗五年)[图 10 页·录文 73 页]
- 碧虚杨真人碑(蒙古中统三年)[图 11 页·录文 75 页]
- 尹宗师碑铭(蒙古至元元年)[图 12 页·录文 78 页]
- 诚明真人道行碑(元至元九年)[图 13 页·录文 82 页]
- 全真教祖碑(元至元十二年)[图 14 页·录文 84 页]
- 全阳周尊师碑(元至元十二年)[图 15 页·录文 88 页]
- 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元至元十三年)[图 16 页·录文 90 页]
- 圆明真人高公碑铭(元至元十五年)[图 17 页·录文 93 页]
- 栖云王真人开凿水记(元至元十六年)[图 18 页·录文 95 页]
- 大元崇道圣训王言碑(约元至元十七年)[图 19 页·录文 97 页]
- 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约元至元十七年)[图 20 页·录文 99 页]
- 大元创建清阳宫记(元至元十八年)[图 21 页·录文 101 页]
- 真元会题名记(元至元十八年)[图 22 页·录文 103 页]
- 马真人道行碑(元至元二十年)[图 23、24 页·录文 104 页]
- 蒙汉文合刻令旨碑(元至元二十四年)[图 25 页·录文 108 页]
- 蔡公本行碑(元至元二十五年)[图 26 页·录文 109 页]
- 摹刻商挺等诗词碑(元至元二十五年)[图 27 页·录文 111 页]
- 清阳宫孙公道行碑(元至元二十六年)[图 28 页·录文 113 页]
- 重阳祖师之图(约元初)[图 29 页]
- 玄门七真之像(约元初)[图 30 页]
- 全真开教秘语之碑(元大德三~十年)[图 31 页·录文 114 页]
- 王重阳诗歌碑(元大德十年)[图 32 页·录文 115 页]
- 天乐真人李公道行碑(元大德十年)[图 33 页·录文 117 页]
- 刘海蟾诗碑(约元大德十年前)[图 34 页]
- 蒙汉文合刻皇帝玺书碑(元延祐元年)[图 35 页·录文 119 页]
- 大元敕藏御服之碑(元延祐二年)[图 36 页·录文 120 页]
- 溥光书“敕赐大重阳万寿宫”碑(约元中叶)[图 37 页]

褒封五祖七真制辞(元延祐四年)[图 38 页·录文 122 页]
重阳万寿宫图(约元中期)[图 39、40 页]
宸命王文碑(元延祐五年)[图 41 页·录文 124 页]
真元会题名记碑阴(元延祐四年前后)[图 42 页·录文 127 页]
披云宋真人道行碑(元延祐七年)[图 43、44 页·录文 130 页]
皇元孙真人道行碑(元元统三年)[图 45、46 页·录文 131 页]
蒙汉文合刻大元宸命碑(元至正十八年)[图 47 页·录文 134 页]
孔端真书“天下祖庭”碑(明正统二年)[图 48 页]
重修祖庭碑(明正统十年)[图 49 页·录文 135 页]
重阳宫庙产碑(明弘治五年)[图 50 页·录文 137 页]
重修大重阳万寿宫文(清乾隆四十七年)[图 51 页·录文 138 页]

佚碑存拓

丘长春祝延圣寿疏(约金末)[图 52 页]
白云真人玄阙铭并序(蒙古宪宗七年)[图 53 页·录文 139 页]
皇帝圣旨碑(元至正二十三年)[图 54 页·录文 140 页]

佚碑存文

活死人墓碑(元宪宗二年)[录文 141 页]

附录一：重阳宫历史[142 页]

- 第一节 刘蒋村结庵[142 页]
- 第二节 宁海收徒立教[153 页]
- 第三节 丹阳弘道[164 页]
- 第四节 由庵到观、宫的变迁[176 页]
- 第五节 明清以来的重阳宫[190 页]

附录二：重阳宫大事记[194 页]

跋

重 阳 宫 道 教 碑 石



版

*王重阳书无梦令碑

金承安五年(1200年)刻立。王重阳撰书。吕道安、毕知常立石。原散置在祖庵镇北郊王重阳墓侧田野,1962年移竖于卢县重阳宫后院集中保护。

此碑圆首方座,身首一体。通高230厘米(其中座高50厘米)、宽94厘米、厚27厘米。碑额横题行书“无梦令”3字。碑正文行草,共5行,满行9字,字径20厘米,前后款小字正书。保存完好。《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陕西金石志》、《续修陕西通志稿》、《金石续编》、民国《重修周至县志》、《道家金石略》等俱有著录。

碑文为:“承安五年岁次庚申重阳日,终南山。」大道长生门户,几个」惺惺觉悟。铅汞紧收」藏,方始澄神绝虑。心」慕心慕,便趋蓬莱仙路。」重阳子书。祖庭灵虚观主吕道安、毕知常立石。”

《金石萃编》云:澄城县亦有《无梦令》碑,内容、书体与此碑相同。

撰书者重阳子(1113—1170),姓王名喆,字知明,重阳子为其号

焉。咸阳大魏村人。家业丰厚。通经史,善武略。正隆间散财乡里,弃家修道,于南时村(今卢县祖庵镇成道官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逾三载迁刘蒋村(今卢县祖庵镇)北结茅居之。后抵山东宁海等地创全真教,门徒奉其为始祖。该教吸收道、儒、释三教之长,以老子的思想为正宗,不尚符篆烧炼,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追封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真君”。武宗至大三年(1310)加封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著有《重阳全真集》、《立教十五论》、《重阳教化集》、《重阳分梨十化集》等。



十方重阳万寿宫记

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年）立石。孔元措篆额，孟攀鳞撰文，张志敬书丹。原散置在户县重阳宫灵官殿东南约百米处田野，1962年移竖于该宫后院集中保护。

此碑螭首龟座。通高516厘米，宽156厘米、厚50厘米。主额篆书“十方重阳万寿宫记”8字。碑文正书35行，行80字。碑侧镌刻富贵图花纹，甚精美。保存基本完好，碑身下部有石花数处。未见著录。

